

第貳章 「大國外交」背景與形成

第一節 歷史之背景與概念的形成

一、「大國外交」的緣由

「大國外交」一詞，在中共官方黨政文件，並未有明確性的宣示及定義，但是「大國外交」是中國近年來外交的一大特點，兩岸間也發表許多相關研究，台灣歷任外交部長胡志強、田弘茂等人均提及中國的「大國外交」對於台灣在國際生存空間的相對威脅性。¹從歷史上來看，中國為五大文明國之一，無論文化與經濟之發展均遠高於周邊國家，以「責任大國」自許²或與各大國交往，均能視為大國外交的方向。

中共自 1949 年建立政權以來，對我外交拓展從未停止打壓，1996 年之「文攻武嚇」策略失效後，於 1997 起展開「大國外交」攻勢，全面調整與推動其與「大國」（美、日、俄及歐盟核心國家）及其他中級區域強國建立友好夥伴關係。³1997 年中國積極與外國進行高層會晤，其次數之頻繁歷年罕見，其中包括與前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互訪、法國總統希拉克訪問中國大陸，以及後期江澤民分別與前美國總統柯林頓及俄羅斯總統葉爾欽先後互訪。

1954 年中國「第一屆人大」首次提及「大國」一詞：「中國已經結束了帝國主義統治下的附屬地位，成為真正獨立的國家，偉大的抗美援朝運動更加強了這一獨立地位，使得中國已經以世界「大國」的身份出現在世界舞台上」；⁴1985 年初期，鄧小平針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提出中國是「大國」的概念，提及「世界上的人在議論國際局勢的「大三角」，坦率的說，我們這一角的力量是很單薄的。我們算是一個大國，這個大國又是小國。大是地多人多，地多還不如說是山多，可耕面積並不多。另一方面實際上是個小國，是不發達國家或叫發展中國家」。

¹田弘茂，立法院第四屆第六會期外交施政報告，中華民國外交部網站，2001 年 10 月 8 日。

²許志嘉，當代中共外交政策與中美關係，頁 257。

³石錄，「中共的大國外交與對台策略」，中央日報，1997 年。

⁴人民日報，1945 年 9 月 16 日。

⁵1990年鄧小平針對蘇聯瓦解提及多極化的大國說法：「美蘇壟斷一切的情況正在改變，世界格局將來是三極也好，四極也好，蘇聯總還是多極中的一個。而中國不要貶低自己，怎麼也算多極中的一極」。1992年江澤民於「十四屆人大」指出，兩極格局已經終結，世界正朝多極化發展；同時在中西雙方關係獲得改善與發展同時，中國對國際影響力亦不斷的提昇。同年九月中國前外長錢其琛於聯合國大會演說時提及：「『國際新秩序』必須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基礎，如此才合乎聯合國憲章的目的與原則。」在「和平與發展」的國家政策主軸下，鄧小平不斷提及創造和平的國際環境，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為對外政策概念，最終以大國姿態將睦鄰友好關係塑型為多極化的情勢。

1993年中國於第八次使節會中仍採取「示弱」、「不出頭」的外交策略，惟鑑於多極化已成為世界潮流，各國領袖的互動關係都將成為國際局勢變化中注目焦點，故中國接下便順應潮流改變外交策略，將自我定位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除發展與「發展中國家的外交」外也自此全力推動大國外交；1994年的「十六屆人大」報告中指出，對外作業上中國開展多邊外交，積極加強國際交流合作，使其地位進一步提高，進而開展另一番局勢。

二、動機與目的

中國大陸把「黨的領導」對為執政的最高原則，在一黨專政條件下，黨和國不分，在內部對黨的地位和尊嚴的刻意強調，也就必然成為外交上對國家地位和尊嚴的高度敏感，而非必定出自所謂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其內涵主要有兩個方面：一、反對國際社會、其他國家、外部政治勢力干涉「內政」，特別是人權、民主問題以及西藏、台灣問題等；二、積極、有限、量力參與國際社會事務，尤以亞太地區的事務為重。

⁵鄧小平，「和平和發展是當前世界的兩大問題」，鄧小平文選第三期（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150。

中國推動「大國外交」，不外乎向全世界宣示其已躋身「大國」之列，相應於中國善於利用世界強權或大國間的矛盾，間接謀取其國際關係及經貿利益的行為，其推動「大國外交」至少還具有下列三個目的：

(一)徹底消除國際大國對中國的安全威脅及提升其在國際事務的發言權與影響力，同時發展對美國的多極制衡力量，藉以謀取經貿利益。1979年7月中中國與美簽訂「貿易關係協定」後即展開熱絡的經貿往來，直至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方取消其最惠國待遇。在1994年10月朝鮮半島核武危機後，中國逐漸建立其「大國」地位趨使中國與美國的經貿關係漸漸穩定。

(二)迫使大國接受其「一個中國」政策，擴散1998年3月柯林頓的對臺「三不」政策，即不支援台灣獨立、不支援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及不支援台灣加入以國家為資格的國際組織，藉以進一步打壓我國的國際活動空間。我國有鑑於此，前總統李登輝先生遂於1999年7月9日提及兩岸關係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此舉亦引起中國方面的不滿。

(三)經過蘇聯解體與冷戰時期結束後，對中國「大國」地位的影響主要來自美國，世界許多國家在對中國經貿外交關係上，往往是看美國的動向而動。利益是大國對外關係的根本，藉由大國地位的認定來建立與國際間大國的夥伴關係。

因此，中國的「大國外交」攻勢，除了不斷對我國在國際地位的打壓外，還有其國際政治地位與經貿利益等多方面的考量。⁶

三、策略與作法

中國「大國外交」攻勢所採取的國際戰略是「夥伴戰略」。以「夥伴外交」為主要手段，以「均勢外交」和「多邊制度外交」為輔，藉以建立長期穩定、共同發展，甚至於全面夥伴關係。中國近年積極推動「大國外交」，其對象包括美、

⁶胡志強，「中共的『大國外交』及我國的因應之道」，《政策月刊》，第50期（1999年），頁30。

英、法、俄等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以及日、德等大國暨東協、歐盟等重要國際組織。透過高層互訪、簽署協定及發表聯合宣言等建立其國際地位，其手段則因對象而異。對美國建立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對俄羅斯從 1994 年的睦鄰友好、互利合作的建設性夥伴關係至 1996 年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對日本，係為和平與發展的友好合作關係；對英國則由全面夥伴關係發展為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對其他大國或中級區域性強權國家，均結為「戰略夥伴」。正如于有慧所提：「中國分別與美、俄、歐、日等大國建立夥伴關係，旨在藉由外交策略以追求影響國際體系的權力，藉由經濟發展後追求國家整體財富以顯示經濟實力。」⁷總之，中國「大國外交」攻勢在於與各「大國」或區域強權及組織建立各種對其有利的夥伴關係，藉以構建共識與合作達成強大之目的。

1992 年「中共政治報告」提到：「兩極格局已經終結，各種力量重新分化組合，世界正朝著多極化方向發展。新格局的形成將是長期的、複雜的過程」，「我們同周邊國家的睦鄰友好關係處於建國以來的最好時期，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團結、合作進一步鞏固和加強，同世界各國包括西方發達國家的關係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得到了改善和發展。我國的國際影響不斷擴大，國際地位不斷提高」。中國在此時期並未提及多極化世界格局或大國外交的概念，主要是專注在突破六四天安門事件後美國等西方國家對其政治、經濟之制裁，此時仍以「和平共處五原則」作為與各大國改善關係的準則。

1997 年期間，中國舉辦「國際形勢與中國外交務虛會」，會中提及自 1996 年以來中國與其他大國關係調整的幾項因素：

（一）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發展前景和十億人口的潛力市場備受世界各國看好，促使世界上許多國家積極調整與中國的國際關係。

（二）經濟因素促進國際關係的加速發展，使各國相互依存不斷加深，特別是國與國之間的經貿合作，更將國與國利害關係拉近。

⁷于有慧，「中共的大國外交」，《中國大陸研究》，第 42 卷第 3 期，(1999 年 3 月)。

(三) 美國強勢主宰國際事務，受到中、俄、法等國的嚴峻挑戰，迫使中共不得不與列強進行戰略協調。

(四) 多極化進程在各國積極推動下迅速發展，然而大國關係的調整還是處於發展階段，亦即多極化世界格局還未形成。俄、法分別在中亞和非洲與美明爭暗鬥，美、俄在中亞對資源進行外交戰，中國和第三世界總體實力的增強，皆動搖雙極世界的形成。⁸

中共在十四大報告中反映其「大國戰略」的意識如下：⁹

(一) 當前國際競爭的實質是以經濟和科技實力為基礎的綜合國力較量。在「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概括下形成，包括經濟、政治、科技、教育、文化、人口、軍事、外交等各方面的一整套方針及政策。

(二) 嚴格遵守聯合國憲章和國際準則，反對任何形式的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和侵略擴張行為，少數幾個國家壟斷和操縱國際事務，是行不通的。

(三) 把人民解放軍建設成為強大的現代化正規化革命部隊，擔負起保衛國家領土、領空、領海主權與領海權益，維護祖國統一和安全使命。

1996年4月中國與俄羅斯宣布發展平等信任，面向二十一世紀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1997年4月，江澤民訪俄羅斯與葉爾欽簽署關於世界多極化和建立國際新秩序的聯合聲明，表示「雙方將本著夥伴關係的精神，努力推動世界多極化的發展和國際新秩序的建立」，「雙方主張確立新的具有普遍意義的安全觀，認為必須摒棄「冷戰思維」，反對集團政治，必須以和平方式解決國家之間的分歧或爭端，不訴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以對話協商促進建立相互瞭解和信任，通過雙邊、多邊協調合作，尋求和平與安全」。¹⁰同年9月，江澤民在「十五大報告」中指出：「大國之間的關係經歷著重大而又深刻的調整，要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繼續改善和發展同發達國家的關係。」雖然「大國外交」的詞

8郭景芳，「不平凡的一年－1997年國際形勢與中國外交務虛會」，《外交學院學報》，1998年第1期，頁70-71。

9江澤民，「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

10「江澤民主席和葉利欽總統簽署，中俄關於世界多極化和建立國際新秩序的聯合聲明」，人民日報，1997年4月24日，版1。

語並未明白地出現在這份報告中，但是中國高層提出與「發達國家」改善關係的說法，亦表示中國將以發達國家取代第三世界成為其外交主要戰場，與大國的關係從此成為中國外交的方針。此外，「十五大」報告中對「多極化」亦有下列之描述：「多極化趨勢在全球或地區範圍內，在政治、經濟等領域都有新的發現，世界上各種力量出現新的分化和組合。大國之間的關係經歷著重大變革」。

1998年台灣學者董立文於「論中國的『大國』意義與問題」一文提出：「大國思想雖然長期存在中國的對外政策和行為中，但是成為外交政策的主流趨勢是1997年「十五大」之後的事情」。中國的大國思想仍不十分成熟，「韜光養晦、絕不當頭」的外交思想與「大國外交」的戰略構想之間相互矛盾；中國對「發展中的大國」、「區域性的大國」與「全球性的大國」之定位仍未釐清，且三者邏輯上也不能並存；中國當局對於後冷戰時期的多極化甚至國際格局等現象之界定仍不明確，故影響其對自我「大國地位」正確的分辨。¹¹

1995年9月中共第十四屆五中全會閉幕時江澤民曾指出：「發展是硬道理。中國解決所有問題的關鍵要靠自己的發展；增強綜合國力、改善人民生活、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保持穩定局面；頂住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壓力，維護國家主權和獨立；從根本上擺脫經濟落後狀況，躍升為世界大國之林，均離不開發展，我們有充分的條件繼續實現經濟的較快增長，必須抓住機遇、珍惜機遇、把握機遇以加速發展」。

1996年中共「十五大」後，中國外交的核心內容有三：

（一）創造及維持和平、穩定國際環境：就中國而言，當務之急是發展國內經濟，提高綜合國力，進而提昇生活水平。不僅內部如此，國際環境亦是如此，這是鄧小平與江澤民的共同認知，盡可能與世界各大國和周邊國家「和平相處」。

（二）爭取及維護中國的「大國」地位及其尊嚴：中國大陸將「黨的領導」作為執政的最高原則。在一黨專政條件下，黨國不分，在內部對黨的地位、作用

¹¹董立文，「論中國的『大國』意義與問題」，《中山人文社會科學期刊》，第6卷第2期（1998年12月），頁67。

和尊嚴的刻意強調，也就必然演化為外交上對國家地位、作用和尊嚴的高度敏感。而並非一定出自所謂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

（三）謹慎卻堅定不移地積蓄國力，擴大軍事力量：為了成為軍事、政治、經濟大國做準備，鄧小平儘量避開大國間的直接爭端，而是利用大國之間的矛盾牟取外交利益，但是這種外交方式隨著冷戰結束已不可行了。

第二節 現實之背景與概念的形成

中國推動「大國外交」的目標，是要營造多極化的世界格局、提昇其大國地位，同時遏止台灣分離主義的擴大。中國的「大國外交」自 1997 年後積極推動，歷經「波灣戰爭」、「九一一」事件，造成國際局勢大幅變動，在十六大結束後亦產生新的領導人，對於中國「大國外交」的策略可依照國內情勢、國際情勢及台海穩定狀況三方面探討。

一、國內情勢

(一)發展國內經濟成效：

中國自 1980 年代起以經濟建設作為中心，實行地緣政治外交與對外開放策略，同時與周邊國家改善關係，使其對外經濟和貿易合作融入國際體系。進入 1990 年代，中國面臨著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的產業結構調整，為中國大陸勞動密集化的經濟結構，提供了更多的發展空間和市場，中國大陸的偏低的勞務價格使其未來二十年經濟發展進入高成長階段。

近年來，亞洲其他國家的經濟也依賴中國高速成長的經濟實力，特別是 1997-1998 年亞洲金融風暴時，中國始終堅持人民幣不貶值，而且尚有餘力金援泰國、印尼，此舉不僅令日本顏面盡失，同時也促使美國加入救援行列，促使中國的國際地位大幅躍進。¹²中國憑藉強大經濟力量提升其在東亞區域的重要性和影響力，同樣地也提升其軍事潛力和國際威望。

中國大陸外貿進出口總額由 1978 年的 206 億美元到 2005 年突破 6000 億美元，從世界貿易排名第卅二名一舉提昇到世界第六大國。以其國內局勢而言，中國大陸只要保持社會安定、政治穩定的局面，利用國外資金和技術來縮短發展時間、節省成本，充分利用國內資源以持續高經濟成長。¹³

前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戴相龍於 2001 年 1 月指出，銀行體系中不良放款佔所

¹²唐家璇，中國外交，2002 年。

¹³程超澤，「江澤民時代經濟發展面臨的機欲與挑戰」，《亞洲研究》，第 28 期（1998 年 10 月），頁 149。

有未清償貸款的 25%，相當於國內生產毛額的 25%。因此，中國高額不良放款情況與發生金融風暴的東亞鄰國則不相上下。朱鎔基出任中國總理時，其主要任務就是改革國營企業和國營銀行的陋習，因為金融改革將影響到經濟是否持續成長，改革的成敗對於中國領導人能否繼續掌握政權的未來性息息相關。¹⁴

中國經濟經過 20 年的快速成長，大都仰賴銀行貸款、公債以及外國直接投資 (FDI)，¹⁵1997-1999 年間，由於亞洲金融風暴導致外國投資資金大幅滑落，但到 2000 年已大幅回升，且為外國願意直接投資的第二大對象。¹⁶中國大陸的廣大市場雖然對外資具有相當大的吸引力，但中國體制轉型的成功與否，除了將影響其經濟能否持續成長外，進而影響其政權能否持續鞏固。

(二)穩定共黨政權：

自 1994 年起，中國遂進行對台政策為主軸的大國外交戰略，透過高層領導人（國家主席、總書記、總理）頻繁出訪美、俄、日、歐盟等各大國，透過領導人出訪大國的作為，與各國政府領袖就政治、經濟、民生、軍事等問題進行協商，表達自身的政策需求，以獲得大國間的支持和諒解。

中國政權的穩定來自黨、政、軍的全面掌控，避免內部分裂與滲透進而推翻其政權。中共「十五大」中，可由人事安排清楚地顯示江澤民的地位因權力的重劃更形鞏固。江澤民也意識到今後的中國大陸必須深化國內經濟改革，使中國大陸在 10-15 年內躍升為世界經濟超強地位。¹⁷

此外，中國透過「大國外交」的實際作為，宣揚江澤民的外交路線，強化江澤民在外交政策的主導權，對於江澤民政治地位的穩定具有相當大的助益；另一方面中國為了激勵中國大陸的民心士氣，並走出「六四天安門」事件後的外交困境，邁向大國地位，故建立一種積極性的民族主義，轉移人民在改革過程中所受

14 「中共中央關於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求是雜誌，1999 年第 20 期，頁 4-20。

15 Richard J. Ellings、Aaron Frirdberg，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戰略亞洲：權力與目的（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2002 年 7 月），頁 38-39。

16 “Enter the Dragon,”The Economist, March 10, 2001.

17程超澤，「江澤民時代經濟發展面臨的機欲與挑戰」，頁 148-149。

到不安和挫折感，對於中國大陸國內政治、經濟、社會局勢的穩定具有一定成效。

(三)經濟成長過程的困難與挑戰：

中國改革開放後，經濟發展迅速，但是卻衍生內部轉型過快的問題，進而造成經濟體制不健全，在能源不足及 WTO 衝擊下，經濟是否維持能成長，仍是必須努力的目標。

中國大陸經濟學家董輔初指出四個困惑現象：(一)經濟高速度增長的同時，失業率也在上升；(二)居民收入持續增長的同時，城鄉貧困問題仍然令人關注；(三)銀行存款增加的同時，一些企業卻在禁受著資金短缺的問題；(四)財政收入迅速增長的同時，財政赤字也在增加，尤其是一些地方財政還入不敷出。¹⁸

經濟發展的同時，伴隨而來的是生產所需的大量能源，中國大陸的石油開採一直以東部地區油田為主，自 2000 年以後即逐年減產，其國內產量的減少，迫使中國石油仰賴外援（進口），同時多方接觸中東產油國家，其中最主要牽動中國能源利益的國家就是伊拉克及伊朗。中國在中東地區的外交目標就是維持地區和平，避免能源來源受阻，這也是中國反對美國攻打伊拉克的原因之一。¹⁹

中國大陸經濟發展迅速，人民物質的需求、對政府的不滿日益增加，而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的矛盾面更浮出檯面。除了國內經濟體制改革外，例如治安問題、經濟犯罪、法輪功宗教、種族衝突等，都直接影響到中國政治的穩定性。江澤民認為社會治安不僅為社會問題，亦關係到政治穩定與共黨執政地位鞏固與否。²⁰

中國透過大國外交與各大國發展外交關係，不但民間交流頻繁及溝通管道暢通，對於各大國政治、經濟、社會發展過程的經驗交換意見，更從西方大國引進一些符合中共自身需求的先進觀念和制度，如民主制度、人權、宗教自由觀念、法律制度、行政管理制、金融管理技術、環境保護、都市發展模式等。

¹⁸中國時報，2002 年 10 月 21 日。

¹⁹工商時報，2002 年 9 月 12 日。

²⁰工商時報，2002 年 9 月 12 日。

二、國際情勢

中共體認到國際權力平衡的現實，在「十五大」首次提出與「發達國家」改善關係的說法。²¹ 中共認為雖然傳統權力平衡可以改變國家間力量的對比，卻無法改變相關國家外交政策意圖或利益衝突的現實，相反地，「夥伴外交」假定國家之間的相互依賴，可使它們的共同利益多於衝突利益，發展與其他國家的合作關係，以增進本國的對外政策目標。²² 中國推動大國外交的對外目標分述如下：²³

(一) 拉抬自身大國地位，提升國際地位與影響力，並發展對美國多極制衡的力量。江澤民在十五大對外政策提出多極化趨勢在全球和地區內不斷地發展。在 1999 年十月建國五十週年講話中，江澤民又強調中國致力推動世界多極化的做法包括下列幾項重點：1、堅持睦鄰友好政策：對中國大陸鄰國之間存在的爭議問題，著眼於維護世界和平穩定的大局，通過友好協商和談判解決，一時解決不了的，可以暫時擱置，求同存異。2、要進一步加強與第三世界國家的團結合作。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繼續改善和發展與發達國家的關係，對彼此之間的分歧要對話，而不對抗。3、要積極參與多邊外交活動，充分發揮中國在聯合國以及其他國際組織中的作用。²⁴

上述論點反映出中國的外交戰略是自許為第三世界國家的領導者地位，結合第三世界經濟落後的國家對抗中國所言的霸權國家，同時分化西方大國，使它們與美國採取不同的立場。所以中國推動大國外交的目的，不僅與西方大國進行政治和解，更是藉多極化格局的共識，以制衡美國的霸權主義行為。

中國在大國間推動多極化世界格局的具體成效，分別於 1996 年得到俄羅斯

21 「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所有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廿一世紀—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求是雜誌》，1997 年第 18 期，頁 2-23。

22 俞正梁等，**大國戰略研究—未來世界的美、俄、日、歐盟和中國**，頁 338。

23 參閱胡自強，「中共的『大國外交』及我國因應之道」，《政策月刊》，第 50 期（1999 年），頁 30；楊志恆，「中國大陸情勢發展及其對東南亞安全之影響」，刊於廖淑馨編，**千禧年的東亞安全和兩岸關係**（台北：政大國關中心，2000 年），頁 34-44；李登科，「北京的大國外交策略之分析」，刊於鄭宇碩編，**邁向廿一世紀的中國外交：回顧與前瞻**（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01 年），頁 66-76。

24 人民日報，1997 年 9 月 22 日，版 4。

的允諾，以及在 1997 年與法國達成共識。中國透過大國外交的互動關係，分別與美、俄、法等聯合國安理會理事國建立新型夥伴關係，結束「西方對中國不公平的制裁」。²⁵

中國透過「均勢外交」聯合俄、法等國推動世界多極化以牽制美國單極獨霸的形成，1997 年 4 月，江澤民與葉爾欽於俄羅斯共同簽署「中俄關於世界多極化和建立國際新秩序的聯合聲明」，雙方同意推動世界多極化。近年中國以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地位牽制美國對於區域衝突的處理方式，最明顯的例子是美軍對伊拉克進行軍事行動的制裁，因中國與俄羅斯的同聲反對，使美國透過聯合國力量維持中東和平工作遭受極大的限制。可預見的是聯合國將成為未來中國在國際事務上制衡美國霸權主義的主力戰場。冷戰結束之後，美國的全球地緣政治戰略由兩大洋向歐亞大陸擴張，矛頭直指俄羅斯和中國，企圖完全支配歐亞大陸和全世界，藉以建立以美國為核心的單極獨霸的全球體系。²⁶

冷戰後期，中國意識到美國儼然成為唯一超強，故中國在冷戰後的戰略佈局是實行大國外交，其目的是利用多極力量以制衡美國。²⁷

（二）破解西方國家對中國的「預防性遏制」策略。針對西方國家的預防性遏制，中國以夥伴關係為主的大國外交戰略作因應之道。1997 年江澤民與美國達成「建立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的協議，同年中國、法國亦同意建立「全面夥伴關係」，1998 年歐盟與中國決定建立「全面夥伴關係」，同年日本積極邀請江澤民赴日訪問，並積極提議建立美、日、中國、俄國四方安全磋商機制。在 1997 年中國與西方大國建立各種「夥伴關係」後，使其外交信心大增並樂觀地認為它與西方的關係已擺脫「六四事件」的陰影。²⁸

2001 年 10 月美國國防部在「四年期國防總檢報告」中明確指出美國基於四大因素適度調整其國防計畫：第一、在重要軍事地區部署更多的美軍基地，使

25 「中國參與國際事務的自信越來越強」，《中國評論》，1998 年 4 月號，頁 83-84。

26 李義虎，「中國應隨國際格局變化調整戰略」，《中國評論》，1999 年 8 月，頁 33。

27 由驥，「回應後冷時代挑戰－中國亞太外交戰略」，刊於田弘茂編，*後冷時期亞太集體安全*（台北：業強出版社，1996 年），頁 256。

28 「中國外交與世界」，*文匯報*，1998 年 4 月 30 日，版 A5。

美軍擁有更大彈性，重心置於東北亞及西太平洋；第二、在更多國家取得暫時的軍事設施，使美軍即使沒有永久性的基地仍能訓練與操演；第三、根據區域需要重新部署美軍；第四、提供足夠的動員能力，使美軍有能力迅速進行遠距任務，有效打擊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敵人。²⁹

就中國周邊的地緣關係而言，因為中東與西南亞是美國反恐重要區域之一，故美國勢必要在亞太地區尋找更多軍事基地。同時美軍在駐軍之外更對中亞各國，如巴基斯坦及印度等進行大量經濟援助；日本也藉此機會擴大軍事活動範圍，企圖控制東南亞軍事安全命脈。綜觀全局，美國運用地緣關係的戰略佈局，已經造成中國周邊環境安全出現不利變化，由此可見，中國企圖以「大國外交」破解西方國家的「預防性遏制」並沒有奏效。

（三）向各國謀取經貿利益，包括吸引外資、科技轉移、增加借貸、及拓展商機。中國在和平發展國內經濟的指導下，首要是持續經濟發展；為了達成此一目標需融入現今的世界經濟體系和制度中，以得到迫切需要的外國資金與科技。自 1986 年以來，中國在恢復關貿總協（GATT）的會員身分上採取積極的態度，中國在加入世貿組織（WTO）十多年的談判過程，不惜作出開放大陸市場的重大讓步。2000 年以後，日本是中國第一大貿易夥伴，美國為中國第二大貿易夥伴，德國則是中國歐洲的最大經貿夥伴，整體而言中國與各大國已發展出密切的經貿合作關係，藉由推動「大國外交」的效益，使中國大陸的經濟建設更為發達。

（四）中共藉由「一個中國」政策及柯林頓對台「三不」效應，不斷打壓台灣在國際的生存空間。1996 年中國外交部提出一份評估報告，檢討該年台海飛彈試射軍事演習和當前國內外情勢，並調整成對台的新外交戰略，也就是「大國外交」戰略。藉由該軍事演習清楚地向美國傳達中國對台的底限，同時杜絕台灣將台獨希望寄託於美國介入之幻想。當時中國外交部預估到美國總統柯林頓連任成功的機率很高，當時柯林頓表示願意與中國進行接觸來建立穩定的中美關係。中國外交部並且表示對台工作重心轉移到外交鬥爭的第一線，積極進行孤立台灣

29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September 30, 2001, p.12.

的目的，遏制台灣推動的「務實外交」，迫使台灣回到政治談判桌上。³⁰

由以上得知，中國與各國建立各類型的夥伴關係之際，要求各國恪遵「一個中國」原則，不得與台灣發展正式（官方）的關係；並將「台灣問題」定位為「中國內政」的框架，堅決反對「台灣獨立」、「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等意圖，同時反對外國勢力介入「中國」內政。³¹1997年10月「柯江會談」後，中國正式展開「大國外交」攻勢。隔年六月美國總統訪問上海時公開聲明對台「三不政策」（不支持台灣獨立；不支持一中一台、兩個中國；不支持台灣加入以主權國家為成員的國際組織）。在柯江會談後一如美方事先向我台灣所做之保證，並未簽署「第四公報」，亦未將「三不政策」形諸文字。美國總統柯林頓訪問大陸期間，美政策官員重申對我保證及對華政策不變者，達20次以上；1998年10月江澤民出訪俄羅斯之際，要求在聯合聲明中加上「第四不」（不向台灣出售武器）。隔月江澤民訪問日本時，要求仿照美國「三不」做法，而日本僅宣稱「一不」，即「不支持台灣獨立」。中國在對台軍售議題上，除了得到俄羅斯不對台軍售的承諾外，並且強烈要求美國遵守「八一七」公報（逐次減少武器質與量，最終停止軍售）的相關規定，同時威嚇法國、荷蘭、德國等，不得再度向台灣出售武器。

中國海峽兩岸關係協會常務副會長唐樹備宣稱，台灣須做出以下四點行動以恢復兩岸對話：1、停止爭取加入聯合國；2、台灣領導人停止到與中國建交的國家；3、停止搞雙重承認；4、停止大量向外國購買先進武器。前三項間接表明台灣必須放棄「務實外交」，藉以達到中國在國際上孤立台灣的目的。

（五）遏止「中國威脅論」擴散。遠東經濟評論表明中國在南海諸島大張旗鼓的行動，對於向來深信中國「不稱霸」外交政策的人感到驚訝。1992年美國學者孟羅（Ross H. Munro）發表「亞洲真正威脅是來自中國」一文，曾提及「中國威脅論」，內文亦指出中國收購前蘇聯部分先進武器後，將大幅提升其對外的軍事干預能力，在蘇聯解體及美國的菲律賓空軍基地撤軍後，中國首次在亞太地

30楊中美，**中共外交教父錢其琛**（台北：時報文化，1999年6月），頁230-232。

31殷天爵，「中共『大國外交』與『夥伴關係』之研析」，《共黨問題研究》，第25卷第3期（1999年3月），頁89。

區面臨沒有敵對威脅的情勢，此時是中國加強亞太地區地位的絕好時機。³²1993年美國時代雜誌（Time）專題中指出中國已有主導東亞的野心，藉由建立遠洋海軍，將軍事領域擴展到南海群島、西沙群島、釣魚台等海域。³³

同年美國知名教授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發表專文指出不同文明間的衝突將是未來國際政治最危險的不定時炸彈，其中回教好戰主義、中國儒家文明將與西方基督教文明發生難以避免的衝突。中國不斷擴充軍備，間接向亞洲各國展示武力的挑釁動作，將引發亞太地區的不穩定與危機感，特別是美國的關注以及亞洲等周邊國家的猜疑。³⁴因此，支持「中國威脅論」者強調美國除要加強自身的軍力外，更應在中國大陸周邊部署反飛彈系統等因應措施，如此才可以鞏固亞洲地區的盟邦，進以遏制中國的勢力。³⁵

32 Ross H. Munor, "Awakening Dragon: The Real Danger in Asia is From China," Policy Review, No. 62(Fall 1992),pp. 10-16.

33 James Walsh,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Foreign Affairs, Vol. 72, No.5(Summer 1993),pp. 22-49.

34陳欣之，「東協諸國對『中國威脅論』的看法與回應」，《問題與研究》，第35卷第11期（1996年11月），頁19。

35 David Shambaugh, "Growing Strong: China' Challenge to Asian Security," Survival No.36(Summer 1994), pp. 46-59.

第三節 決策者之背景與概念的形成

中國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與周恩來對中國在冷戰期間的對外關係具有絕對性的影響，使中國在美蘇兩強權間取的最大利益。第二代領導人鄧小平觀察冷戰後的國際體系，提出「和平發展」理論，爾後的領導人諸如江澤民、胡錦濤等人在遵循該理論時，對國際形勢環境下適時修正國際政治理論，並以「大國外交」建構國際新秩序。本節即針對中國第二代及三、四代領導人對國際格局認知進行探討。

一、鄧小平期間

1985年鄧小平提出「和平發展」的理論，不但強調經濟發展的重要性，更首次提出了「大國」的觀念。1980年代末期，東歐共產國家發生巨變，鄧小平提出中國是「大國」的正式宣示：「我們是一個大國，只要我們的領導很穩定又很堅強，那麼誰也拿中國沒有辦法。中國一定要有一個具有改革開放形象的領導集團。」³⁶從鄧小平於1985年和1990年的兩段論述分析，中國國力雖然有所提昇，但是仍與美國有一大段差距，「韜光養晦」是持續發展國力的最佳策略；另一方面採取「我們算是一個大國，這個大國又小國」的謙卑態度，避免中國成為單極體系的挑戰者；此外，中國以「中國不要貶低自己，怎麼樣也算是一極」的說法，進而激勵民心士氣發展經濟，成為國際政治意涵的「大國」。

馬克斯主義是以「獨立自主」為國際戰略思想，馬克斯與恩格斯也同時強調，「國際聯合」不能否定國家與民族的獨立。因此毛澤東曾說：「中國必須獨立，中國的事情必須有中國人民自己做主張」；周恩來同時強調：「外交問題有一個基本立場，即中華民族獨立的立場，獨立自主、自立更生的立場」；³⁷因此，鄧小平遂行「獨立自主」政策曾提及：「國家要取得真正的政治地位，在經濟政策和外交政策上都要自立自足；不要指望中國作他國的附庸；為利世界和平，堅持擁

³⁶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頁128。

³⁷周恩來，周恩來選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頁321。

護和平，反對搞戰爭與霸權」。³⁸同時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政策並給予「獨立自主」新意涵：「捨棄閉關自守，改倡議國家的主權獨立及行使主權的自主性，強調每個國家可以依據國情不同，自行制訂及執行以維護本國根本利益的外交政策，上述所為不僅不允許任何外來勢力的干涉與侵犯，亦不依附於任何大國與國家集團，藉此立場處理國家對內與對外的一切事務」。³⁹1982年中國「十二大」政治報告中，正式朝「獨立自主」方向前進。⁴⁰1986年中國總理趙紫陽首次在官方文件中，正式確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主要內容與基本原則。⁴¹

冷戰結束後，中國以「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為最終目標。1998年中國前外交部長唐家璇曾指出，「獨立自主」外交政策的三大方針為：堅持獨立自主、維護世界和平以及促進共同發展。鄧小平的「獨立自主」政策以「和平」為主要架構，強調惟有實現和平才得以順利發展經濟，進而提升國家整體國力，獲得應有的國際地位；因此，鄧小平的「獨立自主」即是主動權操之在我，而「和平」旨在以和為貴，藉由「相互依存」換取周邊及國際安全環境，如此才能穩定的從事經濟發展。

「國家利益」首要在維護國家獨立，而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應從國家的戰略利益出發，所以對外政策是中國「國家利益」的根本所在。⁴²因此，鄧小平體認到國際情勢已由「戰爭與革命」轉向「和平與發展」。在鄧小平「三個有利於發展經濟」⁴³理念下，將國際政治的戰略理論由「戰爭與革命」轉為「和平與發展」，作為外交政策的具體方針。「國家主權」是確保國家處理內務時，不受其

38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頁202、266。

39國防大學訓練部組編，鄧小平理論（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374；梁守德、劉文祥，鄧小平的國際政治理論（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155。

40胡耀邦，「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收錄於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39-46。

41趙紫陽，「關於第七個五年計畫的報告」，收錄於中共年報1987（台北：中共研究雜誌社，1987年），頁6-75~6-77。

42俞正梁等著，大國戰略研究：未來世界的美、俄、日、歐盟和中國（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頁349。

43有利於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生產力；有利增強社會主義國基的綜合國力；有利於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他國家干預或限制的最高權力。⁴⁴1970年聯合國安理會頒佈〈國際法原則宣言〉，其中將各國主權平等原則列為國際法的基本原則，同時規定主權平等的六個要點。⁴⁵

中國在面對「六四天安門事件」時，依舊堅持維護「國家主權」及保衛「國家安全」，進以確保「國家利益」的三大方向。雖然中國大陸因閉關自守政策造成國內經濟停滯不前，然而中國的發展對世界和平與世界經濟的發展仍有正向的影響。⁴⁶

因此，在1971年美國前總統尼克森指出：「現今的國際社會呈現出美、蘇、日、中、歐等五大主要國家力量」，自此「五大力量中心」此一說法便廣為各國學者引述。⁴⁷1980年代中期，國際政治戰略思想從國家安全轉變為經濟安全。因此，鄧小平主張國家利益概分三個方向：一、安全利益：國家主權、安全與穩定，領土的完整與統一；二、政治利益：國家穩定；三、經濟利益：經濟發展與四個現代化。在對外關係態度，中國主張追求雙方面的利益而不強求單方面利益，以「國家利益」作為雙邊及多邊關係上的輕重與利弊。⁴⁸1990年代初期，鄧小平明確指出，所謂「多極」的國際格局，「中國」應算是一極；蘇聯雖然國力不若往昔，但仍是多極世界格局中的一員。⁴⁹同年，鄧小平談及下個世紀是「亞洲太平洋世紀」的思考，其中明確談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不長的時間內將成為一個經濟大國，現在已經是一個政治大國了。聯合國的席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⁵⁰但是受到「六四天安門事件」與蘇聯等共產政權瓦解的影響，國際大環境並不利於中國。

44萬建偉，**世界外交知識辭典**（杭州：杭州出版社，2001年），頁6。

45法律上一律平等，享有主權的固有權力，有義務尊重他國的國際人格，國家的領土完整和政治獨立不受侵犯，各國均有權力選擇政治、社會、經濟及文化制度，有責任履行國際義務；梁守德、劉文祥，**鄧小平的國際政治理論**（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135。

46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頁78-79。

47 A.E.鮑文，力量中心—理論與實現、小川明雄，美中蘇日歐—世界的五極結構、保羅·甘乃迪，大國的興衰、約瑟夫·奈，美國定能領導世界。

48梁守德、劉文祥，**鄧小平的國際政治理論**，頁123-144。

49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頁128。

50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頁353。

值此，後冷戰時期，中國官方及學者即不對主張國際社會體系中的主要大國之間，已因權力消長而形塑成「多極化」的國際格局輪廓。⁵¹1993年李鵬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蘇聯解體標誌著兩極格局的終結，當今世界正朝著多極化方向發展；其後的中國官方文件，即將國際格局朝多極化發展，列為「對外政策」的指標性策略。

中國前外交部長錢其琛於1992年聯合國大會演說時提及：「『國際新秩序』必須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基礎，如此才合乎聯合國憲章的目的與原則...」。在「和平共處」原則外，除了注重國家利益及安全，同時透過聯合國等國際組織，使國際關係體制化，形成相互依存的關係。冷戰後，中國的外交政策也曾以下述三個方針為發展方向；首先加強國際間往來；再者，採取睦鄰友好原則，積極發展與週邊國家的關係；⁵²三者，對於國際問題的處理次序由「東西問題」改為以「南北問題」為主軸。⁵³

二、江澤民期間

在中共「十三大」四中全會中，任命江澤民為新任總書記，此一動作正式宣告第三代領導核心—江澤民時代來臨。因為「六四天安門」事件，當時的中國正處於鄧小平執政以來外交的最低點，世界強權國家均對中國的經濟、軍事、文化和外交上進行抵制。因此江澤民上任第一要務便是打破外交孤立，重回國際社會。

在「六四天安門」事件及蘇聯解體後，中國重新調整外交策略，其主要原因如下：第一，「六四」事件前，中國將注意力放在美蘇兩超級強國身上，支持美國同時抑制蘇聯的外交策略，隨著冷戰結束，歐盟成為歐洲經濟、軍事的主要力量自然中國也將歐盟視為外交重點之一；再者，「六四」事件以前，中國利用冷戰的特殊環境營造美、蘇對壘中的外交利益，也因為如此，中國的大國地位往

51熊云，**面向廿一世紀的國家發展戰略**（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1年），頁4。

52顧德欣，**鄧小平國際戰略思想研究**（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63-79。

53江振昌，「國際新秩序的探索與中共」，收錄於石田收，**廿一世紀中共政治結構的問題：社會主義意識立場和一黨專政否兩立**（台北：政大國關中心，1993年），頁62。

往取決於美國的「戰略夥伴關係」。但是「六四」事件後中國對美國的战略重要性嚴重降低，美國對中國開始採取遏制手法。但是因歐盟對「六四」事件的反應不如美國強烈，因此中國把在發達國家中打破外交孤立的重點放在歐盟各國上。

進入江澤民時代後，其所面臨的國際環境主要問題包括：在一超多強權體系下如何維持與大國的穩定關係？快速的軍事化腳步對於鄰近國家的威脅，如何因應其他國家的聯合抵制？從江澤民的談話看來，中國外交始終是以經濟建設為核心，以和平發展為主軸，僅就國際形勢變化調整對外步伐。

江澤民在「十四大」五中全會閉幕詞的講話中重申了鄧小平的「廿八字方針」，同時也提出了自己的思考方向，即「居安思危、奮發圖強、抓住機遇、加快發展」。隨著江澤民權力穩固及大陸經濟形勢的好轉，中國對美外交政策亦有所更動，在此概分為三大趨勢：

(一)、利用台灣問題逼美國讓步：如前總統李登輝先生訪美康奈爾大學，造成美國外交聲討美國運動，召回駐美大使，甚至中斷與美國相關合作領域。

(二)、在國際場合對美國外交政策提出批評：在經濟上提出「反報復清單」對抗美國的報復名單。

(三)、中國對美國不再容忍的態度：江澤民 10 月參加聯合國大會時，要求以國家元首身份訪問華盛頓，不參加任何美國總統的任何公開場合，雖然都只是堅持其以國家元首身份出席，但是亦表態中國對美態度。

1994 年江澤民訪問俄國同時建立「建設性夥伴關係」後，⁵⁴中國在同年亦宣佈「面向廿一世紀的新型國際關係」，而江澤民提倡的「新夥伴關係」則在 1996 年正式展開。⁵⁵表面而言，江澤民在「十五大」談話中幾乎蕭規曹隨，如反對霸權、睦鄰友好及堅持獨立自主等方向，都是鄧小平時期所積極推動的政策。

在此，將江澤民時期的外交政策概分五大方向：一、建立與大國之間互利

54畢英賢，「中共與俄羅斯關係—從正常化向夥伴關係過渡」，《問題與研究》，第 33 卷 11 期，頁 5。

55張玉良，「當前中國全方位外交新特點」，收錄於房樂憲，**面向廿一世紀的國際戰略規劃**，頁 129-142。

合作的基礎；二、主導其區域組織，提昇中國國際間的領導地位；三、加強對話合作，防範國際間的緊張與衝突；四、參與多邊組織活動，提昇國際地位；五、改善外交關係，慎防台灣的外交突圍。

江澤民是在特殊的時刻被推上「第三代核心」的寶座。⁵⁶自其主政以來，面對國內外局勢的變化，在接收鄧小平的權威與格局亦有相當程度的利弊條件。就有利的部分，在沒有外來干預的直接安全威脅，內無政治干涉及叛亂的環境下，加強其各項現代化建設，如政治、經濟、外交；不利的因素方面，面臨西方和平演變的改革開放過程，共產主義難以抗拒其中內部造成的複雜問題等，均是中國當局棘手的地方。因此，在後鄧小平時期，江澤民除了以「鄧小平理論」旗幟外，在外交作為上恪遵鄧小平「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沈著應付、韜光養晦、善於守拙、絕不當頭」的廿四字訣。⁵⁷

鄧小平死後，江澤民才算真正主政的第三代領導，在對外政策除了強化「十四大」中所提的對外政策：「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積極發展同世界各國的友好關係，維護世界和平，促進世界發展，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建立國際政經新秩序。」；⁵⁸以及在「十五大」政治報告中有關「中國對外工作十條方針」，⁵⁹更擴大為「堅決維護主權、領土完整與國家尊嚴，努力推進祖國統一大業……必須旗幟鮮明，堅持原則進行卓有成效的工作和必要的鬥爭」。⁶⁰縱觀中國近年的外交作為，已逐漸走出鄧小平「韜光養晦、絕不當頭」的既定策略，而採取積極的強勢作為，⁶¹其主因應是江澤民執政

56阮銘，*透視總書記*（台北：財訊出版社，1998年），頁4。

57魯競，「江澤民主政後中共外交走向分析」，《中共研究》，第30卷第3期（1996年3月），頁26-27。

58張保民，*中國大陸研究基本文件*（台北：人間出版社，1994年），頁68-69。

59中共對外工作十條方針包括：一、堅持獨立自主；二、反對霸權維護世界和平；三、致力於推動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四、尊重世界的多樣性；五、堅持睦鄰友好；六、進一步加強同第三世界國家的團結與合作；七、在和平共處的五原則基礎上，繼續改善和發展同發達國家的關係；八、堅持平等互利的原則，同世界和地區廣泛開展貿易往來、經濟技術合作和科學文化交流；九、積極參與多邊外交活動；十、在黨紀關係四項原則基礎上發展新型的黨際交流和合作關係等，香港*文匯報*，1997年10月17日，版3。

60何加正，「江澤民接見使節會議代表發表重要講話」，*人民日報*，1998年8月28日，版1。

61江澤民對外交具體任務提出四項原則：一、處理與世界各大國關係，推進多極化趨勢；二、處理周邊國家關係；三、與發展中國家聯繫；四、參與多邊外交。又規定必須旗幟鮮明，進行必

後，亟欲提昇其國際形象及中國希望在國際舞台中扮演重要的領導角色。

江澤民在中國黨政「十五大」的報告中提及，對於外交政策以「一個不變，三大目標」為中心。⁶²在中國的大國外交架構中，其主要對象為美國，日本、歐盟等國家可提供經濟援助與發展；而俄羅斯則是可資聯手的夥伴。在後冷戰時期，中國逐漸拉攏俄羅斯，以平衡政治上超霸的美國、經濟實力強盛的日本，藉以調整取得平衡以及良性互動，中國的大國外交才得以展現其影響力，進而拓展國際視野，達到其外交戰略的終極目標。

基於權力政治，致使大國關係及國際體系之變遷，向為世人關注的焦點，冷戰後的中國為抑止國際社會不斷報導的「中國威脅論」，前總理朱鎔基於 1999 年四月在美國首都華盛頓演講時提出：「中國威脅論」應當改為「中國機遇論」。⁶³另可以江澤民所倡議的「居安思危、奮發圖強、抓住機會、加快發展」的外交方向，做為發展「機遇與挑戰」大國外交戰略的新方針。

中國實施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其目標包括主權獨立、領土完整和民族尊嚴，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為改善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爭取長期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⁶⁴中國當局曾把「反霸」列為 1980 年代三大任務之一，當時所指的霸權主要是針對前蘇聯，在中國的十五屆五中全會所提出的新世界三大任務，已不見「反霸」字眼，2001 年朱鎔基在「九屆人大四次會議」中，再也不提到「反霸」；然而江澤民於同年 4 月訪問阿根廷期間卻把「反霸」列為中國外交政策的目標。

冷戰後的國際體系，面對兩極格局的終結，針對多極化世界格局的發展，其過程與發展並非偶然，而是歷史大變動後的進步。⁶⁵是以中國強調冷戰後的國際體系呈現「一超多強」格局，而「中國」正好處在成為大國與強國之間的歷史

要鬥爭的四個領域為：涉及世界和平與地區穩定；涉及發展中國家的權益；涉及世界和平與地區穩定；涉及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問題。石沙，「多極化體系裡的中共外交」，*中央日報*，1998 年 11 月 27 日，版 3。

62 宋梓華，「十五大後的中國外交走向」，*香港文匯報*，1997 年 10 月 27 日，版 5。

63 中國威脅論「消」中國機遇論「長」，*新華網*，2003 年 1 月 2 日。

64 轉引自 <<http://www.fmprc.gov.cn/chn/7511.html>>

65 顧德欣，*鄧小平國際戰略思想研究*，頁 55-62。

轉淚期。學者有鑑於此建議採取以下具體步驟：首先必須蓄積國力；其次避免直接挑戰當今霸權國家；三者與現在的霸權國家採取合作態度；四者認清主客觀的國際局勢且順勢而為；五者確定國家發展目標且量力而為。⁶⁶

中國在「十六大」報告中指出，「十五大」以來，中國在對外工作上，廣泛開展雙邊和多邊外交，積極參與國際交流和合作，促使國際地位進一步提高，並開創出一番新局面。

三、胡錦濤期間

如今全球面臨冷戰結束以來最多的不確定性因素，美軍進駐伊拉克之後造成中東格局重組及不穩定，國際恐怖主義活動再度猖獗，朝鮮核武問題攤牌後亦引發一連串的化學反應。在中國國內，國際形象面臨「六四天安門」事件以來最大挑戰，無論是歐盟或是英美等國，均在政治、經濟、外交各方面對中國實施懲罰性制裁。故胡錦濤既要就上述問題表態中國立場，更要提升中國的國際形象。

2002年4月胡錦濤任職中國國家副主席期間，出訪馬來西亞與美國等國家。繼中國高層李鵬訪問日本、江澤民出訪五國與朱鎔基走訪三國後，此一作為是胡錦濤在接掌大權前的一次重要外交出擊。縱觀中國此次外交佈局，以反制美國單邊霸權，發展自身區域強權力量，建立多極格局為其外交方向。此外，胡錦濤與美國的交手策略不外是採取「軟中帶硬」的兩手策略。胡錦濤的外交之旅，內逢十六大人事交接，權力尚未穩固的敏感時刻；外則為美國展開「反恐」主義及重新架構全球戰略體系的布局。

自2003年5月起，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對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及蒙古等國進行訪問，一方面胡錦濤向世界展示自己的形象；另一方面，也可以管窺其未來對中國外交政策的走勢。期間出席在莫斯科舉行的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第三次會晤，並在聖彼得堡舉行的建市三百週年慶典及法國埃維昂舉行的南北領導人進行非正式對話會議。這一系列外事活動不僅涉及中國的雙邊外交和多邊外交，

⁶⁶王在邦，「世界領導者地位交替與歷史的反思」，《戰略與管理》，第13期，頁26。

還涉及中國同鄰國、主要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關係，這是國際傳媒稱為「謎一樣」人物的胡錦濤就任國家元首之後的首次亮相。

「九一一」之後俄羅斯迅速向美國的靠攏，北京方面清楚意識到，傳統的戰略三角關係已不符合實際，在此戰略思維下，中國領導階層對於做為中國外交基石的對美關係上，採取了多方的攻擊與策略：一是避免中美走向對抗，胡錦濤的走訪正是此一策略的運用。二是以多邊外交縮減美國的國際影響力。三則是加強國力確維自身利益。

因此，有別於江澤民在 1990 年代後期大幅度提升中國國際地位的大國外交政策（甚至於在聯合國大會上大出風頭），胡錦濤外交政策的傾向務實營造良好的國際環境，以便專注國內建設，謀求國內經濟的發展。

2002 年 7 月，美國國會美中安全評估委員會的《美中經濟關係對國家經濟安全的影響》報告指出，中國的崛起威脅不僅是美國的國家利益，甚至威脅到亞太和世界安全。⁶⁷ 全球化時代的來臨，使得中國大陸的高勞力密度及廉價的物力人力，造成國際市場的恐懼，面對廣大的市場及強烈的競爭下，國際社會面對崛起茁壯後的「中國威脅論」時，中國應如何藉「機遇挑戰期」化解危機為轉機，以「和平崛起」之勢，重新塑造中國對全世界的貢獻。⁶⁸

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為了消弭「中國威脅論」，指示中國中央黨校前副校長鄭必堅，全力建構「和平崛起的中國」理論作為新的國家發展理論；鄭必堅於 2003 年 10 月提出三個已被視為「和平崛起的中國」理論的基礎，分別為：堅持經濟和政治改革，為「和平崛起」提供制度保障；宏揚中華文化，作為「和平崛起」的精神支柱；統籌各種利益關係，為「和平崛起」創造社會環境。⁶⁹

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曾公開提出中國「和平崛起」的概念，並指出其發展道路的要義在於：中國的發展，不應當也不可能依賴外國，要在擴大對外開放

67 陳子明、王軍濤，**解除中國危機**（香港：明鏡出版社，1996 年），頁 202。

68 石齊平，「全球化與中國 中國與全球化」，《商業週刊》，第 840 期（台北：商智文化公司，2003 年 12 月 29 日），頁 12。

69 「胡錦濤命建構和平崛起論 鄭必堅提三戰略」，**中國軍事天地**，2003 年 12 月 17 日。

的同時，依靠自身的體制創新。⁷⁰同年 12 月，胡錦濤基於國家利益，堅持的表達「三個堅持」，⁷¹並強調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就是走「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2004 年 3 月溫家寶再次定義「和平崛起」為：中國和平崛起，就是要充分利用世界和平的大好時機，努力發展和壯大自己；中國的崛起靠自己的力量，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鬥；中國的崛起，不會妨礙任何人，也不會威脅、犧牲任何人。⁷²

冷戰之後，中國企圖創造以經濟為核心的年代，使中國大陸經濟蓬勃發展並提昇綜合國力，但「中國威脅論」即如影隨形，因此中國改以強調今後的戰略目標是「維護和平、促進發展」、「不稱霸、不擴權」、「共存共榮」等三大主軸，是故胡錦濤才有「三個堅持」之說，並強調走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是走「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

70溫家寶，「提出廣泛文化對話和文化交流」，**新華網**，2003 年 12 月 11 日。

71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堅持走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

72「中共中央領導論中國和平崛起」，**新華網**，2004 年 3 月 26 日。

第四節 本章結論

中國在後冷戰後時期係以「國家利益」為戰略核心，將國家戰略定位於「世界性大國」層次，並將戰略目標計畫在廿一世紀成為亞洲政治經濟大國，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並以經濟外交較政治及安全外交為優先，藉此與世界融合接軌。鑑於現實的外交政策不僅要考量自身國家利益，亦要尊重其他國家的利益，進而開拓共同利益且有助雙方政治的往來。

在中國對台「文攻武嚇」失敗之後，其內部便重新界定國際形勢與對台政策的辯論，所謂的「大國論」也正式成形。⁷³中國學者閻學通曾說：「冷戰結束後，中國崛起的狀況愈發越明顯，國人也感到中國在世界上的國際地位不斷提高，於是認為中國崛起的國際環境不錯。」⁷⁴「中國崛起論」在某種程度上可說是中國大陸的共識，同時也是「大國外交」的重要論證基礎所在。

般鑑國際社會中之「大國」者，都有各自獨特性的實力，進而影響全球性或區域性國際事務的運作及處理方式，針對實力特性可區分政治性、軍事性、經濟性，依據影響力可區分地區性、世界性、超級大國。⁷⁵尤在冷戰後的國際體系面臨轉型之際，各國外交政策為因應國際格局，而呈現出力量轉移和分散之狀況，是故中國的國家利益概以對外關係作為出發點。⁷⁶「外交」不僅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對話」，更加注重「妥協」之基本精神，所以制定外交政策時，常因涉及國家傳統的歷史淵源、地理環境及國家利益等因素，而影響外交政策路線。⁷⁷值此，外交工作應採取因地、因時制宜之靈活運用原則，始能適應瞬息萬變的國際環境。

中國在「大國外交」的國際體系中所扮演之角色，依據鄧小平之三大外交方針概略如下：

(一)、韜光養晦（參與且融入國際體系）：舉凡欲保持權力不變者，係在維持

73石祿，「中共的大國外交與對台策略」，中央日報，1998年9月21日，版9。

74閻學通等著，中國崛起：國際環境評估（天津：天津出版社，198年），頁58。

75余起芬，國際戰略論，頁233。

76阿爾溫·拖夫勒，權力轉移（成都：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361-362。

77萬仞，「戰略與外交」，《國防雜誌》，第14卷第3期（1998年9月），頁16-18。

權力現狀；欲改變現存的權力關係者旨在表現；另或是增加權力者係在執行威望政策。⁷⁸ 中國在後冷戰時代的對外政策上不僅面臨挑戰，而且必須進行根本性的重新選擇；由鄧小平主張的「務實外交」及「全方位外交」兩大策略可知，若無法利用世界市場國際分工加速國家經濟發展，則無法對中國大陸經濟進行深化改革與發展，以符合中國現代化建設的終極國家利益。所謂為外交政策為一國處理國際事務的指導原則，或是為達成國家利益所執行的手段與策略，甚至於影響其他國際行為者的行動皆可謂之；外交政策之目的在擴大國家利益，首要在生存，所為無非是在適應詭譎多變的國際政治而已。⁷⁹

綜觀上述可知，中國當前的外交政策雖是「大國外交」，卻是扮演著參與者的角色。故中國選擇扮演參與者的角色，採取融入國際體系做法，俾爭取國家生存及維護國家安全利益。「韜光養晦」是鄧小平國際理論中「實事求是」的外交方針之一，在對外關係的處置上，以不主動採取攻勢、不挑起意識形態之爭且消除對己不利的疑慮為前提，藉以避免不必要的攻訐。

(二)、絕不出頭(維護主權以彰顯大國地位)：江澤民上任後，第一要務即是從「六四事件」後突破外交孤立的險境，首先設法重返國際社會，藉由處理國際事務如：波灣戰事、南斯拉夫內戰、北韓核武問題等國際事件，以「獨立自主」的策略逐步使「中國」重新回到「大國」的國際地位，並發揮「大國」的作用；「十五」大會後更是積極藉由「實力外交」策略，使中國成為廿一世紀的政治大國甚至於軍事大國、經濟大國的戰略目標。⁸⁰

「國際地位」係指國際體系中各主體之間在互動過程中的關係；意是謀求國家利益的基本要件與保障，甚是對外政策的基本目標。⁸¹ 中國自建政以來，處處受到政治及經濟大國制肘，所以在制定外交政策時評估國際體系的格局變遷，以期獲取國家最大利益。所謂「強權大國」必須具備政治、經濟、軍事等雄厚的實

78張自學，**國際政治**（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88年），頁55。

79李登科等著，**國際政治**（台北：國立空中大學，1996年），頁90-91。

80魯競，「江澤民主政後中共外交走向分析」，《中共研究》，第30卷第3期（1996年3月），頁26-27。

81陳岳，**冷戰後中國國際地位的確定與認知**（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頁158-160。

力，惟今具其一者亦可發揮相對的影響力。

中國藉由參與區域安全機制，可擔任主導者的關鍵性角色，在政治立場上可發揮的最大經濟效益，如在聯合國安理會在波灣戰爭、科索沃戰爭的投票時，適時採取迴避或是棄權態度；參與朝鮮半島核武危機會談甚至於介入印度、巴基斯坦之核武競賽的協調。同時自 1990 年以來，中國建交國已由 137 增加至 165 個國家；1997-2002 年，國家主席、總理出訪計 29 起；香港、澳門行使國家主權，尤其成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無非是在樹立獨立自主的「大國形象」。

82

「絕不出頭」已是外交方針之一，旨在保護中國剛起飛的經濟建設，並充分把握「戰略機遇期」的積極發展，透過務實外交維護國家主權，期使中國能為國際社會接納，進而創造有利於經濟發展的和平環境；再者，以主動積極的作為，如推動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建立夥伴關係，營造多極化國際體系的大環境。

中國正處於崛起的準備階段，並向起飛階段邁進，迴避戰爭已是既定方針，如何在廿一世紀避免軍事衝突或戰事發生，關鍵取決於外交謀略。中國對外策略不僅以「國家利益」為出發點，更考慮與其他國家的根本利益，俾獲得雙方之間的良性互動與結合。⁸³

(三)、有所作為(重經濟崛起以提升綜合國力): 大國崛起多先創造經濟實力，再充實軍事實力，進而擴張成政治實力，形成經濟利益後，促使大國造成霸權大業。當今「大國」者雖以綜合國力為概論，但在主觀認定的程度可分為生存力、發展力及國際影響力，其中前二者可謂為綜合國力的實力基礎。⁸⁴冷戰後，美國、蘇聯的勢力逐漸撤出亞太地區，造成該區域權力形成真空狀態，迫使中國重新審視美、蘇、中戰略三角關係。⁸⁵

亞洲開發銀行行長千野忠男公開指出，亞洲的地緣政治實力正產生變化，

82 「我國堅持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 國際地位顯著提高」，人民日報，2002 年 9 月 30 日。

83 俞正梁，大國戰略研究：未來世界的美日歐盟和中國，頁 327。

84 葉自成，中國大戰略（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年），頁 52-54。

85 紐先鍾，大戰略（台北：黎明文化公司，1975 年），頁 41-42。

中國已成為亞洲地區的經濟強國，其崛起將對東亞經濟一體化引發化學作用。日本「朝日新聞」2003年發表社論，國際性經濟大戲的主角主要由中國來扮演；美國「洛杉磯時報」同年底亦撰文指出，中國在亞洲的地位上升。⁸⁶

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幅度，自1980年代經濟起飛後，1990年代後期即受國際列強矚目；尤其是中國中科院以綜合國力作為評估依據，在「2003年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報告中指出，2000年中國的可持續發展綜合國力排名第七，經濟力居第三、軍事力排名第四、外交能力佔第五位。⁸⁷

中國之所以能在1990年代推動所謂「大國外交」的原因，一方面來自於國際體系變化，亦即美國雖利用蘇聯崩解而建構起「單極多邊」的後冷戰局面，甚至推動單極主義來鞏固霸權。因此，外交政策絕不能僅來自主觀認定，更需要客觀國際環境配合。總之，在藉由改革厚植國力後，中國也配合新的世界格局來調整政策，現階段的「大國外交」重點還是擺在「大國地位」的追尋與落實上。

大體而言，台灣自1990年代起採取「拉寬談判縱深」的策略，亦即在大陸佔有國際主權優勢的情況下，儘可能迴避「一個中國」問題，以增加未來主權交涉優勢，再加上部分領導者被認為具有分離主義傾向，因之兩岸關係目前已進入「冬眠期」。可預見的是，「一國兩制」仍將是中國的主要對台政策，「全面封鎖」的外交政策，甚至於「以商圍攻」的統戰策略均是對付台灣的手段之一。台灣方面僅能在國際劣勢下依賴美國保護，並在領導者推動「實質外交」的努力下，繼續堅持「透過民主制度下的全民公決以選擇未來」的政策主張。理性的外交政策必須與國際環境相互配合；換言之，目前台灣除應落實「拼經濟」政策以保障基本國力外，更須理性回應國際環境要求，如此才確保國家主權的完整性。

86 「外報評論：中國崛起在改變全球經濟政治秩序」，**新華網**，2004年1月2日。

87 「中國可持續發展力排名世界第七位」，**北京晨報**，2003年2月28日，頁85。